

蒙学与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扎根

尧育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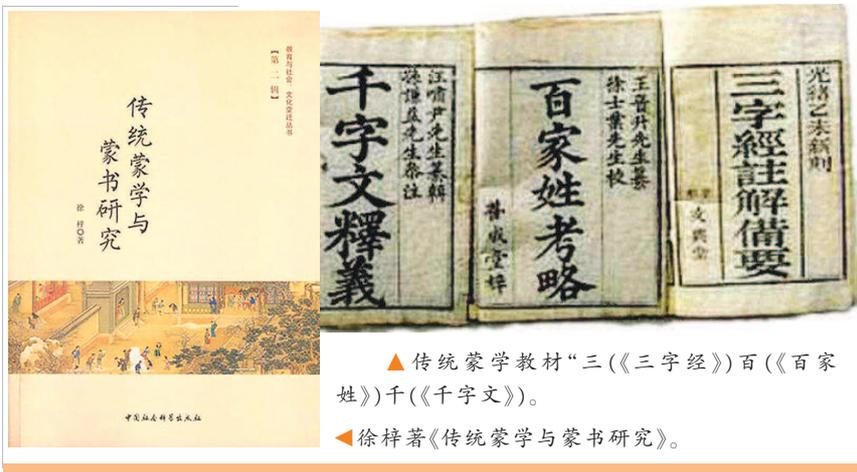
与普遍设想不同,19世纪末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弱,可能并非“中体西用”策略的失效。唐文治等人反思清朝的覆亡,认为“有清之亡,亡于废经”(《汪穉卿先生传》),已将其追至经学的荒废。“废经”动摇了儒学根基,其原因虽出于政府的政令,但“儒学衰,不在于圣人不出、硕学鸿儒之罕见,而在于村里师儒早已绝迹于天壤之间。村夫子绝迹,乃真正儒学命运绝之时。”(《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》)王尔敏等人敏锐发觉中国传统文化的毛细血管破裂,才是近代中国文化转换的关键。

北京师范大学徐梓教授提出:“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其(蒙学读物)中。”他的专著《传统蒙学与蒙书研究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),即以传统蒙学中的教师——塾师问题为核心,揭示这些启蒙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图景、生存状况及社会影响,同时对塾师使用的蒙学教材如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等进行深度解读。

塾师——已消失的传统启蒙者

古人把启蒙教育看作事关后辈一生的重要事业,教师则是其中关键,故而古代学塾,无论是家塾、义塾还是私塾,都注重塾师的择取。具体而言,古代社会对塾师的资格考察相当全面,包括品行、学识、尽心和善教等四方面。尽管完全符合这些要求的塾师并不多,如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的房师周进即是一学识荒芜的塾师,然而,经诸般严格筛选的塾师,毕竟使蒙学的师资水平得到基本保障。宋元时期著名学者陈栌、明前期重臣杨士奇、清代蒲松龄等都做过塾师,即是明证。

然而,对塾师的高标准与其



▲传统蒙学教材“三”(《三字经》)百(《百家姓》)千(《千字文》)。

▲徐梓著《传统蒙学与蒙书研究》。

低收入则成明显对比。明清时期塾师收入主要仰赖束脩、膳食和节敬,通常只能勉强维持温饱。《儒林外史》中的周进,每年束脩12两,扣除伙食费,每月仅剩4钱银子,虽有学生家长送“贖见”,但“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”。张仲礼在《中国绅士的收入》中明确指出,整个绅士阶层中,塾师收入最低,当知县年收入约为3万两时,塾师收入大约只有30两。他们的工作环境也相当糟糕,袁枚诗云:“漆黑茅庐屋半间,猪窝牛圈浴锅连。牧童八九纵横坐,天地玄黄喊一年。”更何况,不少塾师还面临束脩被拖欠的窘境,有诗歌抱怨曰:“东君何事太蛮撞,束脯终年不肯还。擎伞遮阴专为热,围炉向火只因寒。”

无论在小说还是谚语中,塾师都以学识鄙陋和为人穷酸迂腐的形象出现。《儒林外史》中讽刺周进是“呆,秀才,吃长斋,胡须满腮,经书不揭开,纸笔自己安排,明年不请我自来”。《笑林广记》中讽刺更甚,东家的保姆认为自己与先生一样:“我也是哄孩子,你亦是哄孩子,岂不是一样。”塾师的社会价值无法得到普遍尊重。然而迫于生计,大量科场失意者

不得不以塾师为职业谋生。1905年废除科举,旧有的仕进道路全面阻塞,塾师这一传统教育的师资资源才真正面临危机。及至塾师消失,新文化运动便取得彻底的胜利。

教材——童蒙读物《小学》是“五经”的基础

遍布各村社的学塾采纳的教材大体保持稳定,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使各地教育水平不至悬殊,又使国家文化在教材领域维持基本的大一统。此类教材既是传统蒙学的核心构建,也是今天我们认识传统蒙学最重要的途径。

蒙学教材大略可分为:识字类教材,从《史籀篇》以降,至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;韵对及诗歌类教材,如《对类》《声律启蒙》《千家诗》《神童诗》等;图书、故事类教材,如《二十四孝》《日记故事》;辑录儒家及历代贤德人士的嘉言善行,如朱熹的《小学》。这些教材的编选有何目的,寄寓着怎样的文化理想?

回答这一问题,可集中到影

响宋元明清启蒙教育极大的朱熹身上。“朱熹在总结前代启蒙教育经验的基础上,确立了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,并为以后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。”朱熹所说的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是——“小学只教之以事”,如礼、乐、射、御、

书、数之类的技艺,日常生活中的孝悌忠信等。朱熹认为“小学之事,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;大学之道,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。”“小学是事亲,学事长,且直理会那事。大学时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,其所以事亲是如何,所以事长是如何。”朱熹还身体力行编纂了一批启蒙读物,如《童蒙须知》《训子帖》《白鹿洞揭示》《敬斋箴》《训蒙诗百首》等。这些读物在后世影响极大,清人张伯行甚而认为:“朱子以前,小学未有书,自朱子述之,而做人样子在是矣。”他认为,朱熹启蒙教育的思想是教人“做人”。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首“学会做人”不谋而合。

“推动摇篮之手便是推动世界之手”,对启蒙教育的这种现代性认识,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早已有所领悟。朱熹之外,吕祖谦、吕本中、真德秀、王应麟、许衡、程端礼、吕坤、王守仁、陈继儒、张履祥、陈宏谋等人乃至民国时期的章太炎皆致力于童蒙教育,或编纂蒙学读物,或研讨教学方法,付出了大量心力。

朱熹等人投入大量心力参与蒙学教育实践,有为国育才、使文

化薪火相传的目的在,更包含了维系整个传统思想世界的文化理想。小学教育是最为基础的第一步,此后还别有进阶。为此,朱熹等人做了极为妥善的安排。这种文化策略体现在以《朱子读书法》《读书分年日程》为代表的一大批讲求读书及进学次序的书籍中。清代学者施璜在系统总结后认为,“五经”以“四书”为阶梯,“四书”以《近思录》为阶梯,《近思录》以《小学》为阶梯。如此,《小学》在整个传统文化中的位置豁然而出。“此《小学》一书,所以为万世养正之全书,培大学之基本也。学圣人而不务此,如筑室无基,堂构安施乎?如种树无根,灌溉安施乎?故朱子特编是书,以为读书做人基本。”

《小学》类童蒙读物是“五经”的基础,经由《小学》,个体得以窥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——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一大特点。徐梓对此形象地比喻:“如果把传统教育比作一座金字塔,在科举的路程上取得最后辉煌的进士、举人们,就构成了这座金字塔的塔尖,而那些刚刚入学或在家接受启蒙教育的幼童们,则构成了这座金字塔的塔基。”

对传统教育金字塔的塔尖研究,仍是现在学术研究的热点,至于塔基的蒙学教育,显然还存在不少不足。受近年域外汉籍研究的推动,笔者以为传统蒙学研究还有必要将视野放诸域外。《急救篇》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等童蒙读物事实上与科举制度一道,作为国粹影响域外,在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也成为风行的启蒙教材,甚而形成东亚世界的“童蒙读物子文化圈”(张新朋语)。张伯伟先生将这种“近似于启蒙读物”的“文学读本”的演变“视为域外汉籍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值得大力开拓的五大领域之一,认为这有助于深入理解“汉字文化圈”。由此,基于蒙学读物的蒙学研究,不仅可管窥传统文化扎根中国大地的秘密,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亚汉文化圈型塑的奥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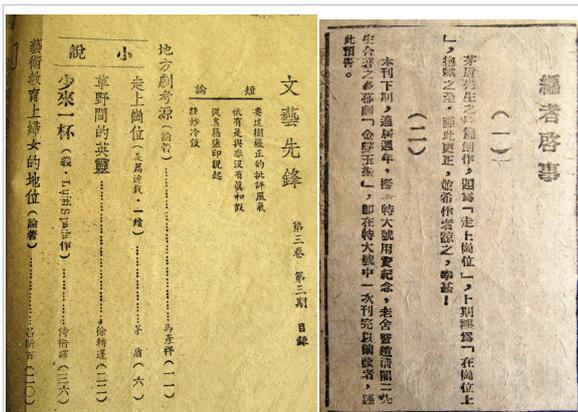
《在岗位上》不是茅盾拟的书名

——关于茅盾《走上岗位》的一点史料

钟桂松

今年6月25日《文汇报》发表王建军先生的《刘以鬯关注茅盾的〈走上岗位〉》一文,介绍刘以鬯先生关注茅盾的长篇小说《走上岗位》,并为出版单行本作积极的努力,史料丰富,叙述清楚,很受启发。同时也为刘以鬯推动《走上岗位》单行本出版的努力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。上世纪80年代初,上海魏绍昌先生经过努力,在日本和国内分别出版了《走上岗位》,为读者了解这部长篇小说全貌、研究茅盾创作提供了方便。

《走上岗位》是茅盾唯一先在国外出版,再在国内出版的长篇小说。魏绍昌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走上岗位》“跋”中回顾了茅盾创作抗战题材作品的过程以及《走上岗位》的传播情况,详细而周到。其中写到在《文艺先锋》杂志发表时的题目变化,“至于第二部《走上岗位》,共



《文艺先锋》第三卷第三期目录及刊登的“编者启事”

十二章(起初第一章发表时书名《在岗位上》)发表在重庆出版的《文艺先锋》月刊三卷三期至五卷六期(1943年8月至

1944年12月)。”

王建军介绍茅盾这部长篇小说时也说:“1943年7月8日,茅盾在重庆唐家沱开始创作《走上岗位》,8月20日在《文艺先锋》第三卷第二期开始连载。至1944年7月20日完稿,12月20日第五卷第六期连载结束。全篇凡十二节,第一节发表时题作《在岗位上》,自第二节起改为《走上岗位》。”对《走上岗位》书名的小小变化,过去茅盾研究界大多

如此认为。其实,《文艺先锋》杂志开始连载时的《在岗位上》这个书名,不是茅盾拟的。

茅盾给杂志社提供的稿子书名是《走上岗位》。从茅盾现存的《走上岗位》手稿看,也是这个书名。

笔者最近查阅当年连载茅盾这部长篇小说的《文艺先锋》杂志时发现,第三卷第三期上有编者的两个“启事”,其一就是和连载茅盾长篇小说《走上岗位》书名有关,照录如下:

茅盾先生之长篇创作,题为《走上岗位》,上期误为《在岗位上》,抱歉之至。谨此更正。并希作者谅之,幸甚。

原来,连载第一章时的书名《在岗位上》不是茅盾拟的,是杂志编辑的工作失误。至此,当时连载《走上岗位》时书名变化的原因便很清楚了。

刊登该“启事”的《文艺先锋》杂志版权页署:发行人张道藩,主编李冬辰,编辑丁伯骝,发行者文艺先锋社(重庆会府街曹家庵十六号),总售处中华图书公司(重庆民生路101号)。这一期的《文艺先锋》上,有短论、小说、词、散文随笔、剧以及论著等等栏目。其中小说栏,有茅盾《走上岗位》,徐转蓬《草野间的英灵》,侍桁《少来一杯》(译文)。作者中,除了茅盾,还有马彦祥、梁宗岱、谢冰莹等。